

# 闽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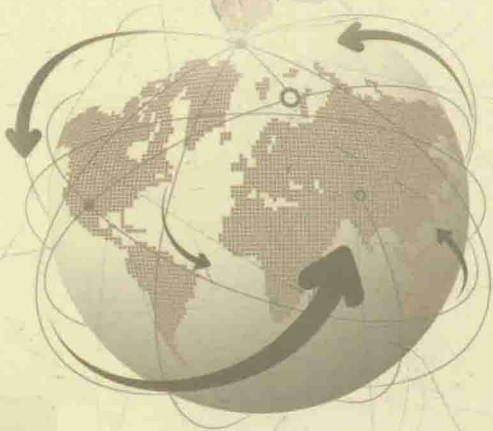
## 的时代传承

闽文化研究学术论丛 之五

MIN WEN HUA DE  
SHI DAI CHUAN CHENG  
MIN WEN HUA YAN JIU XUE SHU LUN CONG

主 编 赵麟斌

副主编 武文茹 卢翠琬



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闽文化研究学术论丛之五

# 闽文化的时代传承

主 编 赵麟斌

副主编 武文茹 卢翠琬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闽文化”中的文学研究、历史名人研究、艺术研究等为主要内容,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品格,彰显了“闽文化”的博大精深,并赋予“闽文化”研究新的意义。

本书既可作为相关研究人员的参考资料,又可供广大热爱福建地方文化的读者阅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文化的时代传承 / 赵麟斌主编. --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6. 10

(闽文化研究学术论丛; 五)

ISBN 978-7-5608-6572-0

I. ①闽… II. ①赵… III. ①地方文化—研究—福建  
IV. ①G127.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0928 号

---

闽文化研究学术论丛之五

### 闽文化的时代传承

主 编 赵麟斌 副主编 武文茹 卢翠琬

责任编辑 陈佳蔚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陈 捷 潘向葵

---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http://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 张 20

印 数 1—2 100

字 数 499 000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6572-0

---

定 价 65.00 元

---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赵麟斌

“连雨不知春去，一觉方觉夏深。”春去夏来，光阴荏苒，转眼间，“闽文化研究学术论丛之五”又与大家见面了。本次论文集所收录的是《闽江学院学报》“闽文化研究”栏目近两年来发表的文章，共计36篇。“闽文化研究”栏目始创于2000年，至今已先后发表了学术论文近400篇，涉及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民俗、方言、戏曲、刻书、服饰文化及闽台文化交流、闽都名人专题研究等方面，在此之前已先后结集出版了四本论文集，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受到了诸多学者专家和领导的肯定。有了这一良好的势头和学术氛围，我们又再次结集出版了这一本《闽文化研究学术论丛之五：闽文化的时代传承》。

通过对有关论文的通览与审阅，我们不难发现，本次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在研究广度与深度方面，既表现出与此前相关研究的继承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近年来，因应着时代发展需要，两岸交流史的研究已成为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而在清代，由于闽台两岸科举教育的一体化管理，当时的福建省会城市福州，成为闽台两地学子文人心中科举圣地、文化中心。“买棹初从福地游，桂花香满越山秋”，榕城优美宜人的风景、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学术风范，使得榕台之间的学术往来，在两岸的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清代榕台两地的儒学、科举关系研究，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敝人所作的《闽都文化与台湾儒学的发展》、省文史馆原馆长卢美松的《买棹初从福地游——台湾士子对福州的科场情结》、薛菁教授的《清代榕台两地儒学教育渊源探略》、徐心希教授的《试论闽都书院与清代台湾社会文化的发展》，皆深入严实地探讨了清代榕台两地深厚的文化渊源，特别是福州对台湾文化教育的深刻影响。此外，论文集还收录了福建书院教育、文学、史学、刻书、民间信仰、闽台两地的民俗交流及方言、评话、戏曲等方面的研究文章。由这些文章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已经有着更为开放的视野，铺陈面较广，涉及近些年闽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应该说是近几年来闽文化研究成果的又一重要展示。

作为一名高校领导兼学报主编，我深知学报对于一个高校的重要性。学报不仅是高校学术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因此，从1998年任福州师专校长至今，我在学报投注了大量的心血，从《福州师专学报》到《闽江学院学报》，看着学报一步步成长，所刊论文的学术含量、编校质量逐步提升，社会影响力也日益深广。我在深感欣慰之余，也更加觉得任重而道远。古人论人生有“三不朽”，“立言”居其一焉。著书立说以求个人之“不朽”，于我或不敢奢望。但





孔子有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学报能为广大的专家学者们搭建一个良好的交流展示平台,以促进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于“立言”之大德,或亦有莫大之助益焉。岂可不黾勉以求之哉!

回首在高校耕耘数十年的成果,“闽文化研究”栏目的设立及相关论文集的编辑发行,于我个人或可说是差可告慰自己的。十几年前,在闽文化研究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我就及时地抓住了这一学术方向,于2000年开始在《闽江学院学报》上开辟了“闽文化研究”专栏,并逐步将其打造为学报的特色栏目。栏目创办后,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近年来,更有多家报纸、刊物对本栏目进行了专题报道和推介,栏目不仅入选了《共和国期刊60年》,还先后获得了“全国地方高校学报名栏”“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及“第二届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等多项荣誉。特别是“第二届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的获得,更是对我们多年辛勤工作的一个极大肯定和鼓励。

当然,这些成果和荣誉的取得,最主要的还是得力于众多专家学者的肯定和支持。如果没有论文作者的慷慨赐稿,没有学报期刊领域同仁的关心与支持,我们是不可能有所创获的。因此,我要借此向众多的专家、学者、同仁们,表达我们最真挚的敬意,特别是全国高等文科学报研究会的历任会长,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全国高等文科学报研究会首任理事长、已故的杨焕章教授,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全国高等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二任理事长潘国琪教授,原《北京大学学报》主编、全国高等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三任理事长龙协涛教授,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副主编、原全国高等文科学报研究会第四任理事长武京闽编审,都对我们栏目的发展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肯定和指导,他们不仅曾为“闽文化研究学术论丛”之一、之二作序,至今还一直关注我们栏目的发展。同时,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原会长练知轩和现任会长徐启源,都对这一栏目极为关心,每年均予经费上的大力支持,并视为研究会工作的一部分鼎力相助。在此,我要再次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和崇敬之情。

闽文化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诸多领域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我们应适时地抓住机遇,努力开拓发展空间。《闽江学院学报》除了应继续发挥自身的学科和地理优势外,还应进一步加强与各个地方院校、地方文化协会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如我们的协办单位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福建省方志办,福建省文史馆,福建师范大学的闽台区域研究中心、闽学研究所,福州大学的闽商文化研究院,福建工程学院的福建地方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福建广播电视大学的闽台文化研究所,泉州师范学院的泉州学研究所,闽南师范大学的闽南文化研究院,龙岩学院的客家文化研究所,等等。这样不仅可以开拓研究视野,还可以整合多方资源,将闽文化研究推向更为深广的方向发展。闽学、海洋文化、闽台合作与交流、福建工艺美术等方面的研究也还不够深入,我们今后可以有意识地引导研究者在这些领域更加深入挖掘。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

点,其悠久深厚的历史地理文化内涵日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深入挖掘闽文化的内涵,探索历史上闽文化在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甚至是全世界的传播与拓展,对于深化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合作往来,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闽江学院学报》“闽文化研究”专栏扩展的方向和空间,亦在其中矣。

是为序。

岁次丙申初夏于福州闽江学院



序

# 目 录

|                             |           |
|-----------------------------|-----------|
| 序.....                      | 赵麟斌       |
| 闽都文化与台湾儒学的发展 .....          | 赵麟斌(1)    |
| 买棹初从福地游                     |           |
| ——台湾士子对福州的科场情结 .....        | 卢美松(8)    |
| 清代榕台两地儒学教育渊源探略 .....        | 薛  菁(13)  |
| 试论闽都书院与清代台湾社会文化的发展 .....    | 徐心希(22)   |
| 宋代兴化书院及藏书楼的兴盛对区域文化的影响 ..... | 薛慧芳(36)   |
| 平潭兴文书院述略 .....              | 范丽琴(42)   |
| 吕祖谦和闽地、闽人及闽学.....           | 程小青(51)   |
| 勉斋先生黄榦门人考 .....             | 方彦寿(57)   |
| 南宋文人的文化生活                   |           |
| ——以林希逸与文人雅士的交游为中心 .....     | 王晚霞(73)   |
| 理学视野下的蔡清诗文研究 .....          | 肖满省(87)   |
| 许友年表 .....                  | 郑珊珊(95)   |
| 林则徐佚文三篇辑释 .....             | 陈开林(111)  |
| 王元稚:亲历台湾近代化进程的福州船政学人.....   | 汪毅夫(115)  |
| 林纾论古文的审美欣赏理论 .....          | 张胜璋(119)  |
| 严复女子教育思想之精义 .....           | 薛  菁(125) |
| 陈衍词学活动考论 .....              | 林增云(132)  |
| 略论五代时期闽国的国计使职 .....         | 吴旭东(140)  |
| 《水浒传传评林》中诗词的编辑和评点 .....     | 严  光(148) |
| 简论明代福州林浦林氏的家学与家风 .....      | 魏宁楠(155)  |
| 福州刘家大院的文学背影 .....           | 吴可文(160)  |
| 清代福建诗人诗歌丛考                  |           |
| ——以林启、林葵、方家澍、黄经藻为中心.....    | 朱则杰(169)  |
| 两宋时期福州刻书考略 .....            | 方彦寿(175)  |



|                           |              |
|---------------------------|--------------|
| 黄裳与《万寿道藏》在福州的雕版 .....     | 许起山(188)     |
| 朱子四书类著述二十一种版本述考 .....     | 朱天助(195)     |
| 明代建阳书坊刊刻小说之概况 .....       | 涂秀虹(203)     |
| 明代建阳书坊主余象斗小说刊本研究评述 .....  | 缪小云(216)     |
| 福建官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承传 .....   | 吴瑞秀(225)     |
| 林则徐的图书情愫 .....            | 黄华美(234)     |
| 台湾文化传承与宋代福州               |              |
| ——以临水夫人信仰及相关传统工艺为中心 ..... | 韩桂华(240)     |
| 明清福州妈祖信仰的发展及其缘由 .....     | 杨 榕(249)     |
| 试探闽地中元节文化传承之渊源 .....      | 汤漳平(259)     |
| 海峡两岸民俗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              |
| ——以闽都民俗文化为样本 .....        | 林 山(271)     |
| 长乐漳港显应宫出土开漳圣王神像之探究 .....  | 汤漳平(277)     |
| 福州方言现象浅析                  |              |
| ——兼谈《福州话实用字典》用字规范 .....   | 赵麟斌 黄 曦(287) |
| 浅论福州评话《新茶花》 .....         | 黎 凤(297)     |
| 永安大腔傀儡戏《海游记》流传探略 .....    | 罗金满(306)     |





# 闽都文化与台湾儒学的发展

赵麟斌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明末以前,“台湾为海上荒岛,靡有先王之制也”<sup>[1]</sup>。荷兰人侵占台湾后,又实行基督教教育,中华传统儒学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在台湾形成影响。台湾儒学的传承发展是从南明郑氏政权时期开始的。收复台湾的郑成功,从小就服膺儒学,在南京国子监求学期间,又曾拜著名学者钱谦益为师,深受浙东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郑成功去世后,郑经执掌台湾政权,进一步弘扬儒学思想。康熙四年(永历十九年,1665)八月,郑经以咨议参军陈永华为勇卫。陈永华不辞劳苦,深入视察台湾各地,见各项事业草创已定,就建议郑经“建圣庙、设学校”,他说:“今台湾沃野数千里,远滨海外,且其俗醇;使国君能举贤以助理,则十年生长、十年教养、十年成聚,三十年真可与中原相甲乙……今既足食,则当教之……须择地建立圣庙、设学校以收人材。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矣。”<sup>[2]</sup>郑经采纳了陈永华的建议,下令择地兴建文庙,《台湾通史》记载:“(永历)二十年春正月,圣庙成,经率文武行释菜之礼(古代入学时祭祀先圣先师的一种典礼)。环泮宫而观者数千人,雍雍穆穆,皆有礼让之风焉。”<sup>[3]</sup>文庙的建立,为台湾儒家思想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扩大了宣传儒学的攻势。此后,郑经又“命各社设学校,延中土通儒以教子弟,凡民八岁入小学,课以经史文章……以永华为学院,叶亨为国子助教,教之,育之,台人自是始奋学。当是时,太仆寺卿沈光文居罗汉门,亦以汉文教授番黎。而避难缙绅,多属鸿博之士,怀挟图书,奔集幕府,横经讲学,诵法先王,洋洋乎,济济乎,盛于一时矣”<sup>[4]</sup>。明郑政权的兴学措施,促进了台湾儒学的勃兴。而大批从福建广东等地迁徙到台湾的移民,早已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为台湾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闽都位居八闽之首,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有着更为特殊的地位,对台湾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有其独特的贡献。闽都文化对台湾儒学发展的影响,最突出的阶段是从康熙至光绪的二百多年之间。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成为隶属于福建的一个府。为了加强对台湾的统治和管理,清政府开放海禁,选拔良吏赴台,维护当地的社会安定。同时,为了改变台湾文教落后的状况,清政府在台湾各府、厅、县设有官学,还设立官办的书院,培养选用官吏,又在各地设官办的社学和官民义捐的义学。学校设立以后,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有雄厚的师资。担任教职的人员大多源于福建,尤其以闽都和闽南为最多。这些教职人员到台湾任教,担任府县各级儒学教授、教谕、训导,他们将传统的儒家文化移植到台湾,极大地促进了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 一、闽都文化与台湾官学的发展

闽都文化对台湾官学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二是闽都与台湾之间的学人往来。

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以后,清代台湾的教育行政一直隶属于福建学政管辖,这种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必然使清代闽台教育在多个层面呈现出一体化的典型特征。赵建群撰有《清代闽台教育一体化考述》一文,分别从教育行政的隶属关系、学校建置的同一格局、教育设施的同一模式、科考的从属关系、师资的双向交流、闽人与台湾学校建置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比如,文中说到台湾学校的建置,多以福建为参照。康熙二十五年(1686),时任台湾知府的蒋毓英曾就设学建校事宜呈告首任分巡台厦兵道周昌,称有关学校设置“未尽规条,应俟题允之日,于泉州就近移查学政事宜,次第修举可耳”。康熙四十二年(1703),建台湾县学明伦堂时,就特地“选匠往会城购料”,之所以要舍近求远到福州置办建筑材料,是因为所置材料必须合乎规制。及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新建台湾府学文昌阁时,“阁制高广各若干,一准福州府奎光阁式”。<sup>[5]</sup>虽然,该文是从闽台层面上进行论述,我们也可以借此考见清代台湾儒学受闽都影响之一斑。

此外,台湾的科举考试都按照闽省的规定执行。在清代,台湾未设乡试考场,为了考取举人的科名,台湾士子都必须渡海到福州参加福建的乡试。因此,福州不仅是闽台最高行政机构所在地,也是闽台科举考试的中心,大量赴榕赶考的学子,都会在福州住上一段时间,有的甚至逗留数月。为了方便台湾学子在福州的生活,台湾当时还在福州设立了台湾会馆,以供赶考士子居住。在福州居住期间,台湾士子必然受到闽都文化的熏陶,这些士子回到台湾,就自然会把闽都文化向台湾本土传播。

为了改变台湾文教落后的状况,清政府在台湾各府、厅、县都设有官学,配备教授、教谕、训导等专职人员从事教学工作。据《重修台湾省通志》记载: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官学起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台湾被日本割据的211年间,清政府先后任命延聘台湾府儒学教授80人,其中福州(十邑)籍人士有33人;厅、县儒学教谕265人,福州籍的有79人;训导299人,福州籍的有78人。据统计,清政府统治台湾期间,任命台湾各级儒学教授、教谕、训导等教职共644人次,其中190人为福州籍人士,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一。<sup>[6]</sup>清代在台执教的福州籍文人多为饱学之士,所聘190人中有进士17名、解元2名、举人121名、贡生50名。<sup>[7]</sup>他们不仅学识渊博,人品高尚,且教学有方,为台湾儒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首任台湾府儒学教授是长乐人林谦光,继任者是福清人张士晃,第三任为福清人林庆旺。在他们的主持下,台湾的儒学教育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林谦光,康熙二十六年(1687)出任台湾府儒学教授,在府学教授四年任上,他笃学历行,诲人不倦。福州人陈志友,出任诸罗县儒学首任教谕,他教学以德行为先,受到当地学子的好评。闽县人叶梦苓,清乾隆十七年(1752)举人,奉派为台湾凤山县训导,在任上,他广设学校和义塾,劝令各家送子弟上学,凤山文风因而大振。





董文驹,字道实,号罗峰,福州闽县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乾隆三十六年(1771)调任台湾府学教授。“有学行。月课生童……衡文慎甲乙,有所改窜,字画必端正。得佳文,则优赏以鼓舞之。与诸生言,必本忠孝诸大节。虽切磋严惮,而和气仍予人以可亲。尝兼监海东书院,逢课期稽察綦严,不徇情面。生童膏火如数按给,毋许丁胥朘削。寒畯赖之。”<sup>[8]</sup>福州人谢金銮,嘉庆十年(1805)调任台湾嘉义县教谕,他强调身教重于言传,“到官未几日,学者靡至,门人日益亲”。福州人陈平皋,嘉庆十二年(1807)调任台湾嘉义县学,“整肃学规,悉除陋习”<sup>[9]</sup>。侯官人刘家谋,道光二十九年(1849)调任台湾府学教谕,他“怜才爱士,敢做敢为”,“为人慷慨豪侠,勤于执教,为人师表,留心文献”<sup>[10]</sup>,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年仅40岁。家住南后街的董炳章,因在上杭县学教谕任上的卓著政绩,受到了沈葆楨的赏识,1874年被调任淡水厅首任儒学教谕。此地文献无徵,冠裳初著,为兴教化、开民智,董炳章兢兢业业,勤勉教化,“兴学教士”一如既往。任教谕三年间,董炳章不懈努力,终因精力透支,卒于任上。此外,福州籍人士到台湾任教授、教谕、训导等职的人员还有很多,他们多能忠于职守,勤于宣扬中华文化,为台湾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二、闽都文化与台湾书院的兴盛

书院是封建社会后期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对中国社会有广泛的影响。书院以儒家经典作为教学内容,同时又随着学术思潮的不断发展,将程朱理学、阳明心学、清初实学和乾嘉汉学纳入教学内容,与宋代以来儒家学术的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在儒学发展的各历史阶段都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书院发挥着培养儒学人才、研究与传播儒家学术的重要职能,是集人才培养、学术创新、文化传播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组织形式。清代,福州著名的书院有四所:鳌峰、凤池、正谊、致用,称为“清代四大书院”。其中又以鳌峰书院最为声名显赫。当时福建学政叶绍本说:“海峤之称文藪者,莫如鳌峰。”<sup>[11]</sup>可见鳌峰书院的重要地位。

台湾书院绝大多数建于清康熙以后,据统计,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光绪十九年(1893),台湾共新建、重建书院60所(其中四所正音书院),每个县都设有书院,其中最多的是台南县,有20所,还有彰化县8所,台北县5所等。这些书院大多与福州书院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深受鳌峰书院影响。台大前教授张正藩写道:“台湾书院所定规制,大体与闽省同。盖台湾居民泰半为闽籍,其所建书院亦多取则于八闽,尤以受福州鳌峰书院之影响特大。”<sup>[12]</sup>

在书院体制创设与发展方面,台湾书院的建筑风格、组织结构等,都与福建相同,深受闽都书院的影响。例如台湾宜兰的仰山书院,就与鳌峰书院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仰山书院“以宋龟山为闽学之宗,而兰之海中,亦有龟山屿,故名仰山,志景行也”<sup>[13]</sup>。也就是说,仰山书院的取名就因景仰杨时(龟山)而得来。仰山书院的创设深受鳌峰书院的影响。陈寿祺“主讲鳌峰书院期间,制定出一系列建设或改革书院教育的制度、措施,如《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拟定鳌峰书院事宜》等,在《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

中强调了八个方面的问题,即正心术、慎交游、广学问、稽习业、择经籍、严课规、肃威仪、严出入等,对学生在做人、修身、治学、治事诸方面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些学规被台湾仰山书院等所因袭沿用,奉为办学的圭臬”<sup>[14]</sup>。道光六年(1826),福建巡抚孙尔准来台巡视时,从福州鳌峰书院藏书中,拨出《史记》《诸葛武侯集》《二程文集》《朱子语类》等共45种166部给台湾的仰山书院,“以为诸生稽览之资,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台湾书院的发展”<sup>[15]</sup>。

鳌峰书院曾直接接收台湾学生,是当时台湾学子心目中高山仰止的求学圣地。所谓“十郡士膝腕足而至”,“十郡”即指康熙收复台湾后,将台归闽管辖,福建由九府加上台湾府共十府。《鳌峰书院志》中详细记载了许多台湾学子来鳌峰求学的情况。鳌峰学子毕业后到台湾任职的也不少,截至1804年,仅取得举人资格、有确切名姓记载者担任台湾教谕、训导的就有8人,至于未取得功名的鳌峰学子赴台任教谋生的也不在少数。他们为促进闽台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他们把闽学带到台湾,在那里教书育人,传播儒家思想,大力发展当地的文教事业,是台湾早期教育的开发者。蓝鼎元就是从福州鳌峰书院毕业的杰出人物,康熙二十一年(1682),他来到台湾后,努力振兴当地的文教事业,在其提倡下,台湾义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蓝鼎元为台湾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深受台湾人民的崇敬。福州闽县人薛士中是著名理学家张伯行的弟子,鳌峰书院生员,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进士。雍正十年(1732)九月,由漳州府学教授调任台湾府儒学教授。雍正乾隆年间,他两次出任台湾府学的教授,首任海东书院山长,并在该书院讲学达6年之久。雍正十二年(1734),因丁忧去职。乾隆五年(1740)再任。他亲自制定院规,严格管理,促进了海东书院的发展。闽县举人黄偁在乾隆年间掌教海东书院,闽县进士陈楷,咸丰间由台湾道陈懋烈聘其执掌海东书院。侯官人陈鹏程,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台湾府儒学训导,同时兼崇文书院掌教。闽县举人梁上春,嘉庆十三年(1808)由福建安溪县教谕调任台湾县教谕,同时兼主崇文书院讲席。侯官进士蔡征藩,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当时的福建巡抚徐继畲推荐主持崇文书院。长乐人柯龙章,清道光咸丰年间,掌教崇文书院数年。又如董炳章在任淡水教谕期间,兼主讲淡水厅明志书院,明志书院为台湾著名书院,清政府曾颁发“文开淡化”的匾额,以表彰书院引导台湾文运之功。由此可见闽都学者与台湾书院的深厚关系,中华传统儒学借由书院教育在台湾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发展。

### 三、闽都文化与台湾的社会教育

除了前文所述的儒学与书院外,清代闽台还有社学、义学、私塾等教育形式,因为他们与普通平民百姓联系更为紧密,我们可以统称之为社会教育。这种普及型的教育,也是儒学思想传播的一种主要途径。

社学是清代各地方的主要学校之一。台湾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建置儒学的同时就开始设社学并不断推广。清代台湾社学有民社学和番社学之分,分别教育汉人和



土著。社学后来渐渐被义学所取代,义学俗称义私塾,是专为贫寒家庭子弟设立的一种学校。从清初起,福建境内即有义学之设,到了道光年间,“推诸一邑之内,无不设塾之乡,无不入塾之童”。清代义学之设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雍正二年(1724),时任分巡台厦兵备道的吴晶祚接受蓝鼎元“宜广设义学,振兴文教”的建议,义学之设在台湾遂普遍开来。与社学一样,台湾的义学也有汉、番之分。私塾是中国古代社会影响广泛的一种民间教育,是由百姓自己出资延请师资教授子弟的教育方式。台湾私塾的设置可以上溯到明郑时期,由于台湾居民多从福建过来,各种民间文化多源自闽省。至光绪年间,台湾私塾的设置更加普遍,成为普及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

前文提到的董炳章,在任淡水厅儒学教谕期间,不仅重视兴办学校,“还致力培训社学骨干,鼓励门人到义塾服务,以使淡水厅多层次教育,均有起色”<sup>[16]</sup>。他还多次深入辖区调查研究,向百姓宣讲儒家教义,并经常资助贫困学生,以至于囊空如洗。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淡水地区文教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董炳章为辖区教化、进步、安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台湾的社会教育中,有一项突出的工作就是“化番”。在大陆移民来台之前,台湾岛上就有少数民族长期在此居住生活,这些居民被统称为番民。为了开发台湾,促进台湾发展,清政府很早就重视设立“番学”,促进土著民族向着中华文化迈进。所谓番学是指清政府在台湾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用以教育土著居民子弟的义学、社学以及其他类型的教育机构,台湾番学的发展与闽都士人的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如曾居住在文儒坊的福州籍戍台将领——台湾总兵甘宝国,除了做好本职工作,维护台湾的安全稳定外,还常深入民间,熟悉当地的风土民情,设立番学,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了土著民族的汉化。而在此方面贡献较大者首推沈葆楨。

沈葆楨(1820—1879),字翰宇,又字幼丹,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官至两江总督,是近现代以来对台湾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清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日本政府借口渔民被害制造了牡丹社事件,派兵侵犯台湾,攻占琅乔(今恒春)。同年六月,清廷紧急任命时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楨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沈葆楨领命后,采取积极防御措施,迫使日本侵略者最终退出台湾,从而避免了一场战祸,保卫了国家的统一完整。日本退兵后,沈葆楨继续留在台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台湾的开发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措施包括:第一,奏请解除渡台禁令,发展台湾生产;第二,增设府县,加强开发管理;第三,开山筑路,发展交通;第四,开矿采煤,发展实业;第五,抚番教化,共同发展。我们这里重点介绍他的抚番、化番工作。当时,生活在台湾中东部高山中的土著居民,仍主要从事狩猎与原始农业,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因此,他们对于汉人多不理解,甚至抱有敌视的心态。沈葆楨认为,要全面开发台湾,就必须安抚教化这些台湾的土著居民,使之逐渐开化,融入汉族社会。因此,沈葆楨高度重视抚番、化番工作,在开发东部地区的过程中,把开山、开路与抚番、化番结合起来。清同治十三年(1874),沈葆楨上《请移驻巡抚折》,针对抚番、化番工作提出几大措施: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修道途、给茶盐、易冠服、设番学、

变风俗等。强调办“番学”不可惜费。<sup>[17]</sup>清光绪元年(1875),沈葆楨上《番社就抚布置情形折》,向朝廷汇报化番的工作进展情况,说到对接受招抚的高山族人示约七条,其中之一就是设番塾。其具体措施是:“令各社均送番童三数人,学语言文字,以达其情。习跪拜礼让,以柔其气。各番闻之,无不俯首帖服。”<sup>[18]</sup>在沈葆楨的努力推动下,仅光绪元年(1875)就在埔里社设立番塾义学 26 处,此后又在刺桐脚、虎头山、四重溪等 14 个较大的番社设立番塾。沈葆楨非常重视番塾教育,还亲自组织编写了一篇《训番俚语》,以五言诗体方式,细说化番要旨,作为番学教材,供各地番塾使用。沈葆楨的化番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台湾番民的生产、文化水平,引导番民开始逐步进入农耕社会,促进了土著居民与汉民族的融合。他的功绩深受台湾人民的敬仰,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评说:“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楨缔造之功,顾不伟欤!”<sup>[19]</sup>可见其功绩之伟大。

官学、书院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是清代台湾最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些教育尽管形式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所传播的思想内容都是以中华传统儒学为主。清代台湾的这些教育机构,都深受闽都文化的影响,这说明在中华传统儒学向台湾传播的过程中,闽都文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以上所述,主要从闽都文化对台湾儒学发展的影响做出考察,这一单向性的叙述是从榕台两地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的。当然,在榕台交流过程中,台湾文化也对闽都文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据道光《续修台湾县志》卷三《学志》所列名册,可以统计出有清一代台湾赴闽任教的人数,其中赴闽任州学学正、县学教谕的举人 7 人,赴闽任县学教谕、训导的恩贡生、岁贡生、例贡生共计 47 人。说明台湾士子对清代福建教育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种双向交流、相互影响的状况,是我们研究榕台两地间的关系时所应该注意到的。

## 注 释

- [1][3][4][13][19] 连横:《台湾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4、195、195、204、673页。
- [2] (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1—192页。
- [5] 赵建群:《清代闽台教育一体化考述》,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编:《闽都教育与福州发展研讨会论文集汇编》,2012年,第133—142页。
- [6] 刘宁颜总纂:《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八《职官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
- [7][12] 徐心希:《试论三坊七巷学人与台湾书院的发展》,《闽江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 [8] (清)谢金銮、郑兼才:《续修台湾县志》卷三,台湾文献丛刊第140种,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第168页。
- [9] 庄为玠、王连茂编:《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 [10] 郑宗乾主编:《寻根揽胜话福州》,福州:海风出版社,2000年,第70页。
- [11] (清)叶绍本:《鳌峰书院志序》,赵所生、薛正兴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十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 [14] 叶伟奇:《三坊七巷名人与清代台湾教育》,《闽都教育与福州发展研讨会论文集汇编》,2013年,

第 130 页。

[15] 林仁川:《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上海:文汇出版社,1991 年,第 214 页。

[16] 董骏:《著述教化 余泽两岸——追记南后街董炳章、董执谊父子》,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福州市三坊七巷管理委员会编:《开风气之先 谋天下永福——三坊七巷与台湾文化研讨会文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3 年。

[17] [18] 沈葆楨:《沈文肃公政书》卷五,朱华主编:《沈葆楨文集》,2008 年。

(2014 年第 4 期)





# 买棹初从福地游

——台湾士子对福州的科场情结

卢美松

台湾在清初复归一统之后,朝廷随即派官设治,大力推行大陆的政策,同时实施教化,即施行文化启蒙与儒学教化,同样在台湾读书人中推行科举考试制度,以统一思想、罗致人才。由于台湾从行政建置之初即隶属福建省,所以对它的行政管理与思想教化,都离不开福建人的参与,尤其在科举考试中,因为福建乡试考场设在福州,大批台湾士子如期来省会应试,福州因此成为闽台科举考试的中心。福州是八闽首邑,长期作为福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教育氛围。以科举成就论,据统计,有清一代,福州府学子中举人数达4607人,占全省总数的44%强。台湾士子对此自然是景仰与羡慕,他们同样热衷于科举仕途,福州便成为台湾士子心目中向往的科考圣地与发迹福地。

连横在《雅堂笔记》中曾记,朱熹当年登上福州鼓山,朝台湾方向占地脉并预言:“龙渡沧海,五百年后,海外当有百万人之郡。”其所预测时间竟与康熙朝台湾重归版图并设一府三县的时间暗合,连横因而感叹道:“宋儒亦有谶纬之术也。”<sup>[1]</sup>其实这位学究天人、道贯古今的古圣先贤,是以超卓的目光观察到台湾与大陆的地缘联系,从而预见间隔一衣带水的离岛将来必有大量大陆移民迁往,中华政教文化必将循此由福建传向台湾,从而造就海外宝岛的兴盛。

台湾的地脉既与大陆相通,文脉更直接大陆,尤其是与福州在历史上有着亲密的关系。清初台湾复归版图后,清廷及治台诸吏十分重视对台湾的教化,特别是儒学教化。台湾纳入在福建举行的乡试大典后,与福州的关系更为紧密。台湾士人饱饫儒学的教泽,认同儒学文化。如丘逢甲在《穷经致用赋》中表白:“士如有志,岂容务博而荒;人待出身,毋致操刀所误。将见研经入选,恒存捧日之心;旋看大用有期,直上凌云之赋。”<sup>[2]</sup>可见台湾读书人一样期盼“研经入选”,凌云大用。台湾淡水人黄敬,中岁贡后授福清县学教谕,因母老而未就任,遂在台设帐教学,被誉为北台“文坛能手”,其所做《劝学歌》有云:“宜勉力,勿徘徊。勿徘徊,人人尽是栋梁材。眼前多少龙门客,那个不从烧尾来?”劝勉学生立定志向,努力读书,期望跃龙门而成栋梁材。

据记载,台湾士子为求取功名,必须到省会福州的贡院参加乡试,即使到清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独立建省之后,仍遵朝廷之命,到福州赴考。早期,台湾士子到福州应试,多是自行赁屋而居,或寄寓亲友同乡处。光绪九年(1883)以后,台湾文风日盛,士子求功名者众,每届参加乡试者常达八百余名,栖息无所,极感不便。于是台湾主政



官员刘璈,特别拨出1.5万两银子,在福州贡院附近购地建造台南、台北两郡试馆。共造3幢楼房,可容台湾士子三百余人入住。同时,澎湖士绅蔡继善,也捐资在福州南台购地,造设台湾会馆,专供台湾赴试举子居住。至清末,在福州贡院之后(北面),仍有“云路”“天衢”两所台湾试馆,由曾任台南县儒学教谕的王润田等人管理。至今,旧贡院地的“天衢边”,尚存百年老屋一幢,或即当年天衢会馆的旧址。

咸丰九年(1859),清廷在福州举行戊午正科乡试,闽台两地应试举子多达九千余人,录取名额也达225名。金门人林豪在参加乡试期间,曾作《棘闱杂咏》20首,并详加自注,记述场中所见的乡试过程。乡试放榜后,台湾举子陈肇兴因首次赴省城应试,即黄榜高中,故十分激动,百感交集,写下一首律诗,名曰《第一楼观榜》,生动地表达自己的兴奋心情,诗云:“买棹初从福地游,桂花香满越山秋。文章远溯千余岁,姓氏高悬第一楼。同榜人夸从古少,题名我爱得朋稠。鲤庭回首黄泉隔,欲写泥金暗泪流。”<sup>[3]</sup>诗中以写实的手法表达作者感慨的心情:初次搭船到福地游学赶考,正值桂花盛开的仲秋八月时节。按当时习惯,台湾考生于小暑前离台,到九月十五日乡试放榜后返台,考试地点就设在越王山南麓的贡院里。当年考试文章的题目是“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陈肇兴意想不到一举中式,姓名高挂于号称“全闽第一楼”的鼓楼之上。同榜的中举者多达225名,真是自古少有;更让人欣慰的是中式的台湾14名举子中,有半数是生平故交文友(作者自注云:“是科中式二百二十五名”“额中十四人,半生平故交”)。兴奋之余又勾起作者深沉的遗憾和感伤:从小教导自己的慈父已不在人世,要书写喜讯捷报也无处投送,唯有暗自伤心流泪。陈肇兴在应试期间,还曾遍游福州名胜,写下一系列纪游之诗,如于山“九仙观”“玉皇阁”,“华林寺”“涌泉寺”,东郊“虞公庵”“榴花洞”以及“登镇海楼”等风景名胜,均有作诗吟颂,诗中颇多赞美之词,表达了他对福州美景风物的赞赏。

同样是赴省参加乡试的台湾举子许南英,便没有陈肇兴那样幸运。他曾经先后三次从台湾到福州赴试。光绪十一年(1885),他第三次到福州应试,船抵马尾时,也曾赋诗七绝《乙酉(1885)乡试,舟至马江口占》,颇有自嘲意味地咏道:“扁舟一棹马江平,席帽依然太瘦生。卖藕小娃犹认得,笑余三度到榕城。”为应乡试三抵榕城,以致卖藕小娃都认出了自己,这使他既感到亲切而又有些自惭。到福州为应试,自然也乘时游览风景名胜,熟悉风土人情。光绪八年(1882),许南英第二次来闽时,曾赋《鼓山纪游诗》,有句曰:“我昔在家山,曾读古闽志。榕城有鼓山,日夕萦梦寐。”“松柏蔽天青,藤萝缠石翠。”“百丈流泉飞,一声清磬坠。”描绘细致且感情深挚,代表台湾士子对福州风物民情的喜爱、流连。此后,他又曾连续三次参加北京会试,终于在光绪十六年(1890)高中进士,但他又无意为官。

有清一代,台湾士子与福州的因缘,确是由科举教育与科举考试而结下的。一些士子或在台湾受教于福州来的教官或山长;或在福州就读,与福州书院的山长、教师有师生之谊,与同窗学子有砚席之情。他们来榕参加乡试,又有了拜师访友的机会。如淡水举人李藩岳,曾经就学于福州鳌峰书院,拜在山长郭柏荫等人门下;淡水举人黄宗